

《外贸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了李璞成同志《中国对外贸易起源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对于通常认为中国对外贸易起源于西汉的看法提出了不同见解。《李文》认为,中国对外贸易起源于奴隶社会,其中陆路贸易始于西周,海外贸易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我认为《李文》提出的一些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于陆路贸易和海外贸易的论述则有可商讨之处。本文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源提出一点浅见供研究参考。

人类社会对外贸易的产生是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明了对外贸易起源的时代,即“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之后,也即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便产生了对外贸易;二是指明了人类社会最早的对外贸易的方式,即“边界贸易”和“海外贸易”。应该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和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史料缺乏,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主要是根据对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对外贸易起源的研究得出的。那末,这个结论是否也适合中国的情况呢?我的看法是,这一结论也同样适合中国的情况。

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是夏。夏代的对外贸易的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作出比较确切的结论。但是,夏时的商业活动已经有了相当规模。推翻夏统治的“成汤革命”,其中商人起了一定作用。商人阶层由于不满夏统治者的敲诈勒索,参加了反夏行

列,促成了夏王朝的灭亡。据此,不难推断,当时夏同周围邻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即边界贸易也必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殷代的商品交换比之夏代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即“市”、“肆”、“邑”和“邑肆”,殷都就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卜辞中称为“大邑商”或“天邑商”。近代在河南安阳小屯

村的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殷墟是殷都遗址。当时殷统治势力囿于河南一带。《诗经·商颂》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邦畿千里,即以黄河南北为中心,西及陕蜀,北及晋北,南尽豫境。殷势力尚未达及滨海一带。可是,从殷墟中发掘出很多货贝、鲸骨、绿松石等海产遗物。这些东西黄河流域是不能生产的,它来自海滨。这些物品既然可以从远地运往殷墟,它当然反映了当时繁盛的对外贸易。

当时,殷周围存在着一些大方国。例如,殷西部的羌方、蜀方,西北部的鬼方,东部的肃方、井方、人方等。这些方国对殷王朝一时反抗,一时服属。反抗时,殷帝国就用武力去征伐。卜辞中就有不少“征羌”、“伐羌”、“征蜀”、“乎多臣伐苦方”、“王往伐土方”、“征人方”的记载。被征服而服属了,殷王便派人去燕享它们,宣抚它们,这些方国也被迫缴纳贡

赋。卜辞中就有不少诸如“帚井示三屯”、“羌卫示七屯”、“氏羌”的记载,即井方贡纳来三屯(织物),羌方贡纳来七屯,征发或征调羌人为奴隶的意思。也有“燕蜀”、“往羌”等记载,即燕享蜀国,派使者去羌方的意思。这当然是携带了赠礼去蜀方、羌方的。在殷同邻国和平共处的时候,也一定是商人活跃时期,双方边境之间必定会发生

中国对外贸易起源之浅见

沈 根 荣

贸易往来。这些就是我国早期有记载的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和边境贸易。因此，我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陆路贸易至少可以推前至殷代。

中国早期的海外贸易，我认为应该早于春秋战国时代。早在殷代，我国就同海外有了往来。《诗经·商颂》有“海外来假，来假祁祁”的诗句。海外来的人，不是来朝贡的，就是来作商业买卖活动的。我想，这样说不至于会有什么問題。

至于中国海外贸易的起始定于什么时期为好呢？我认为把它定于殷末周初恐怕还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当时殷王朝的势力主要限于中原一带，即使有海外贸易，也只能是零星小量的。到了周初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崛起了两大商业势力。周灭殷后，曾把大量殷“顽民”迁移到徐淮地区和东海之滨。这些殷“顽民”——昔日的贵族，由于丧失了政治地位，因而许多人转而经商——从事商业的“商人”这一名词就来源于殷的遗民。殷遗民的商业活动使当时的商品交换大为发展。而徐淮地区、东海之滨又兼有水上交通的便利，因此，当时殷“顽民”的商业活动势必推动海上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另一支殷遗族控制着朝鲜，而朝鲜同东海海岸的海上交通较为便利，因此当时的朝鲜也必定包括在海上贸易的范围之内。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另一股势力是齐国。《盐铁论·轻重篇》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等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疆国”。齐国人寡地薄，因而太公不得不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维持生存，使齐国很快成为一个强国。齐国既然濒临渤海，那末，它必定要利用海上贸易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这两股商业势力，推动着海上贸易的发展，因此，我认为中国海外贸易始于殷末周初的提法还是可以说得通的。

至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海外贸易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就远销希腊。海外贸易如此发达，它的起始就应该早于这一时代。我们还可以从《山海经》一书中看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海外贸易的发达程度。《山海经》历来被视为神话、传说。我认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地理志。内中《海内外经》八卷记载了许多海外国家的奇人异物。这些记载的内容并非都是荒诞不堪，内中有些是确有依据的。例如，在《海外南经》中记有在南方的海外有“不死民国”，“其为人黑色”，这种描述同非洲人的种族特征是相符的。在《海外西经》中有“白民国”的记载，这同欧洲人的特征是相符的。在《海外北经》中有“深目国”的记载，凹目高鼻，这也是符合欧洲人特征的。在《海外东经》中有“黑齿国”，“为人黑齿，食稻啖蛇”。这与今天东南亚一些民族的特征也是相符的。由于这些民族有嚼槟榔果的嗜好，因此使牙齿染为黑色。《海外东经》中关于“汤谷上有扶桑”的记载，更被海外一些学者指为今墨西哥。可见，《海内外经》八卷实际上是古代中国同海外广泛交往的记录。由于当时人们的科学知识有限，传说有误，以至把海外一些风情视为怪异。但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海外贸易已是相当发达这个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中国海外贸易的起始日期应当早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不成问题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文》提出的中国对外贸易不是从西汉开始，而是起源于奴隶社会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与《李文》不同的是，我认为中国的陆路贸易至少可以推前至殷代，而海外贸易则从殷末周初即已开始。

对中国对外贸易起源问题展开探讨是一件好事。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源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不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那样清楚明了。这是同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分不开的。古代中国，主要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域广大，土地平坦，利于陆路运输。海上，则由于面对浩瀚的大海，除少量沿海

（下转第30页）

$$\therefore Q = \sqrt{\frac{2RP}{CT}} \quad (1)$$

$$S = \frac{1}{2}CTQ + \frac{RP}{Q} = \frac{1}{2}CT\sqrt{\frac{2RP}{CT}} + RP\sqrt{\frac{CT}{2RP}} \\ = \sqrt{2RTCP} \quad (2)$$

将前例题之数值代入：

$$\text{经济批量 } Q = \sqrt{\frac{2 \times 20000 \times 240}{0.05 \times 12}} = 4000 \text{ 件/次}$$

$$\text{进货次数 } \frac{R}{Q} = \frac{20000}{4000} = 5 \text{ 次}$$

$$\text{最小库存总费用 } S = \sqrt{2 \times 20000 \times 12 \times 0.05 \times 240} = 2400 \text{ 元}$$

计算结果与前表内计算所得完全相同。

(上接第49页)

贸易外，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而且夏、殷势力对沿海地区控制都很弱，因此当时的贸易主要通过陆路运输来进行。《周易·卜辞》中“舟”字的出现是很难得的，而“车”字却常见，且车之构造复杂，式样不同。《周易·卦辞、爻辞》中有“车”、“大车”、“舆”、“轮”、“幅”等字，可见制车工艺程度已达到相当高度，反映了陆路贸易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但是陆路贸易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其规模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殷、周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尚书》中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的记载。《周易·卜辞》中也有“挈牛五十”等记载。五十头牛的车队当然不小了。但牛车速度缓慢，又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因此，不可能

走很长的路。《周易·复卦》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的卦辞。七日来复一次，其间距离不过二、三百里左右，不十分远。因而，当时中国的商人不可能象古代腓尼基人、希腊人那样飘洋过海，到远方去贸易。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不如当时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那样发达的重要原因。

中国对外贸易从产生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发达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从来没有起过重要作用，除了朝贡贸易外，史料鲜有记载。由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不发达和史料的缺乏，给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源造成了很大困难。我相信，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源问题是一定可以搞清楚的。